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良好基础和突破口

王 微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发展的活力和韧性；有利于为创新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有利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为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提供重要支撑；有利于增强我国市场的吸引力，凸显竞争优势，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为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动力。

面向未来5年乃至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就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等提出进一步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围绕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切实发力，抓住关键问题实现重点突破，不断取得新进展。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备良好基础

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在“大”，关键在“强”。也就是说，国内市场不仅要有庞大的市场规模，而且要有良好的成长性和创新性，更重要的是形成供求相互促进、创新驱动强劲、软硬件环境完善、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与全球市场高效联通的内需市场，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强韧的市场基础。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超大规模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比较优势，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备多方面的良好基础。

我国消费市场持续扩张，提质扩容和模式创新的动力强劲。我国已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国，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41.2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在“大”，关键在“强”。不仅要有庞大的市场规模，而且要有良好的成长性和创新性。需努力形成供求相互促进、创新驱动强劲、软硬件环境完善、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与全球市场高效联通的内需市场，更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强韧的市场基础。

万亿元。近年来，我国消费升级态势明显，服务消费、健康消费、文化消费、共享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不断涌现，消费模式创新层出不穷，为“十四五”时期全面促进消费、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

供给调整加速，新兴领域投资增长显著。201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56.1万亿元。其中，制造业投资规模最大，特别是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投资快速增长。这不仅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继续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也将更好地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营商环境逐步向好，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不断迸发。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准入门槛持续降低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市场主体数量增长较快，其创新潜力也加快释放，新兴技术研发、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涌现，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创新已从探索期进入加快发展期，大量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这些都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注入了创新动能。将逐步实现“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目标。

市场吸引力不断提升，在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其巨大的市场吸引力已经显现出来。2019年，我国货物、服务进口额分别为20771亿美元和5006.8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10.8%和8.6%。同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对外投资国家，涉及制造业、服务业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对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抓住关键问题实现重点突破

“十四五”时期是推动国内市场实现“由大变强”的关键阶段。客观地看，目前我国国内市场距离强大国内市场仍有差距，以强大国内市场促进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约束。特别是消费增长潜力释放尚不充分，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较为滞后，交通、水利、能源、公共卫生、生态环保、农业农村、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少短板和薄弱环节，制度型开放的步伐还需进一步加快，我国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也需进一步提升，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市场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更好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进一步挖掘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完善有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相关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具体来看，需重点实现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目标，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着力促进消费品质提升，加快发展服务消费，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转型；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改善消费环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鼓励消费创新和培育消费新增

长点，开辟投资新空间，加快构建规模巨大、层次完善、创新活跃的强大内需市场。

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以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建设物流枢纽为抓手，积极开拓城乡市场，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加快培育大型流通企业，打造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现代流通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重点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三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适应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多元化供给体系，重点是促进制造业升级和加快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既满足人民生活质量改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服务消费。进一步放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准入限制，支持社会力量增加有效供给。加强基础设施系统化和智能化建设，增强市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

四是营造宽松开放、激励有效的发展环境。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通过国内市场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创新，促进国内大循环不断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五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加大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的开放力度，促进国内外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建立有利于在全球范围配置和利用资源的规则体系，深化国内国际市场的接轨程度，努力把我国市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市场”。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十四五”时期提升工业利用外资水平的主攻方向

刘建丽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投资和产业链国际分工正经历较大幅度的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以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较健全的生产配套体系和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吸引着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流入。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工业利用外资的规模与质量，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态势。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要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资源、广泛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效率的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和实现更高质量的利用外资。与此同时，吸引和利用外资仍然是获取竞争激励、促进分工深化、开展技术学习的必要途径。新形势下，我国利用外资需从规模导向和静态效率导向转向高质量发展导向，“稳规模、提质量”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利用外资的主要任务。

工业利用外资的基础较为稳固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流量保持平缓增长态势，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虽然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导产业，但工业利用外资的基础仍然较为稳固。近年来，工业利用外资金额基本保持稳定，同时，顺应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趋势的外资结构调整仍在进行之中。

一方面，工业利用外资表现出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和服务化的趋势。工业利用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体现在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比重不断提升。“十三五”时期，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年均增长18.3%，其中，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比重不断提升。与工业投资紧密相关的高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也增长迅速。

另一方面，投资拉动的促进作用减弱，但经济效益和整体经济拉动作用依然强劲。2010年以来，外资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外商投资的轻资产化和服务化趋势相关。但外资企业以占全国不足3%的数量，创造了接近25%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贡献了20%左右的税收，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显著。

此外，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扩大开放的前沿和外商投资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引擎。在一系列改革措施和试点政策推动下，自贸试验区正在成为汇聚国内外前沿技术的高端制造业聚集区。

更好利用外资的挑战与优势并存

未来一个时期，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较多，国际经济合作依然存在诸多风险。我们需科学研判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贸、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在具体工作中，既要清醒认识到工业利用外资面临的现实挑战，又要用好既有优势，充分发挥现有有利条件的重要作用，实现高水平利用外资。

当前，我国工业利用外资存在的几方面问题值得关注：外商直接投资日益青睐服务业，总体结构上呈现出一定的“去工业化”倾向；外资企业尚未有效嵌入和链接我国本地产业链，本土制造仍然处于外资企业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利用外资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东部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占比保持在85%左右，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比重没有明显提升。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有效提升我国工业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的突破口。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发展空间大，仍然对国际资本具有巨大吸引力。实现高水平利用外资，我国工业有多方面有利条件。主要表现为：我国外资管理体制加速转型，“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吸引外资的手段由优惠政策转向推动投资便利化，外资企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特别是企业经营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从产业配套和交易成本来看，我国产业链条长，产业体系完善，这些都大大降低了生产企业的配套成本和交易成本，我国在劳动生产率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实际生产成本仍然具有优势；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这些都为实现引资来源地多元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多措并举提升工业利用外资水平

“十四五”时期，积极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和来源、稳定利用外资规模、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是推动工业更好利用外资的主攻方向。

一是适当调整引资方向。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外资企业的产值不应该再成为关注的重点，需建立科学的引资质量评价体系，提高引资项目与产业升级目标的契合度。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关注引资项目的产出效益，还要关注项目的产业链嵌入度和产业创新带动力。同时，切实引导利用外资工作从“引资”向“引智”转变。

二是促进利用外资区域均衡发展。要加快优化中西部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平台，特别是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提升内陆自贸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引导外商投资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还要看到，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需找准定位、积极谋划，推动产业发展，依靠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带动制造业和物流业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

三是积极推动外资来源地多元化，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长期来看，我国需推动更为多元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及投资协定落地，从“产业互补、互利共生”角度推动国际产业合作，拓展外资来源渠道，为我国工业利用外资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升产业链国际合作安全水平。

四是推进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相关制度的细

化和落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的通用制度安排。在实际工作中，对关系到我国产业链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的投资项目进行审核十分重要及必要。目前，现有制度体系对外资进入前国家安全审查的实施主体和操作规程等方面缺乏具体规定，已有相关规定的约束力也很有限，在这方面需进一步细化，落实好相关制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调查研究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课题组

在推进长江航运、金融、技术等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相关行业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同时，沿江11个省份也不断探索和完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多样化合作机制。

但也要看到，沿江各省份在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进一步扩大投资和贸易、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发力。具体表现为：跨境物流体系标准化程度仍然不高、区域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营商环境需持续优化等。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沿江各省份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各自定位，在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上，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完善软硬件条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切实发挥长江经济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积极架设沟通平台。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发展战略层面的对话与协商，进一步推动建立政府协商对话机制。比如，以发展中欧班列贸易、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建立沿线国家间主管部门对话协商机制；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沿线国家为区域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等。同时，也要开展多领域的人文交流。

二是系统化构建多式联运国际物流体系。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建立更加顺畅的国内物流与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需加速

摘编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就要在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下功夫。落实到产业层面，则需在推动传统产业品质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同时，抓紧发展新兴产业，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更好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基于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打造新兴产业链”“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等方面作出了安排和部署。新兴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一代信息网络、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都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未来5年或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期。未来，我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产业发展市场。

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发展需求为基础，有巨大的成长潜力，能对经济社会全局及长远发展起到牵引和带动作用。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积极参与诸多重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代表高科技能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对此，我们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未雨绸缪、早做谋划，深入研判、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加速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朝着满足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结构性短缺仍是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整个创新链和产业链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大。我们既需要技术方面的领军型、创新型、技能型、工程型人才，也需要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有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就能更有力地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攻坚克难，加快补足发展短板，夯实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新兴产业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和土壤。需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进一步放宽对新兴产业的准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打造好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公共平台。尤其是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工作中，要从单一“产业”思维转向“体系”思维，促进跨界融合，形成产业、资金、市场、人才、平台、技术等诸多要素协同的模式，实现产业与市场的高效对接。此外，还要围绕降本增效、供需对接的要求，不断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科技产业化与产业科技化的进程，推动数字技术、高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推动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版责编 栾笑语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融合

推进“一带一路”大通道建设，疏通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堵点”。对此，要统筹建设国内服务中欧班列和海铁联运的物流枢纽及通道，畅通西部南向、东向大通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和场站建设。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建海港、铁路、高速公路、物流分拨中心等基础设施，打造集成的、高标准的物流体系，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三是提升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水平。深入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把长江经济带的优势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巨大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能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为此，要切实发挥城市群的开放引领作用，提升长江经济带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辐射能级；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显著提升其支撑能力；充分发挥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鼓励各类企业联合组建跨国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等。

四是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优化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完善中欧班列运行机制等方面切实发力，特别是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广自贸区内可复制的改革试点经验，进一步健全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同时，着力提升“一带一路”沿线通关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水平。

（课题组成员：成长春 杨风华 黄寰 陈为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际刚 提出：

新兴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